

丁鼎 著

牛僧孺年譜

辽海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僧孺年谱/丁鼎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7. 5

ISBN 7-80638-348-4

I. 牛… II. 丁… III. 牛僧孺-年谱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903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10 千字 印张: 8

印数: 1—500 册

1997 年 5 月新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于景祥 谢 丹

责任校对: 张 丽

封面设计: 强 红

版式设计: 张秀俊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引言	(1)
一、牛僧孺其人	
(一) 家世与仕历	(1)
(二) 政治品格与政绩	(5)
(三) 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10)
(四) 文学修养和成就	(12)
(五) 在“牛李党争”中的地位以及与李党人物 的关系	(13)
二、关于“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牛李党争”的性质与斗争焦点	(18)
(二) 关于“李德裕无党”说	(20)
(三) 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	(24)
(四) 李逢吉与“牛李党争”	(27)
本谱编例	(33)
年谱	(35)
本谱征引文献举要	(199)
附录:	

（一）《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铭 并序》	（207）
（二）《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 志铭并序》	（211）
（三）《旧唐书·牛僧孺传》	（216）
（四）《新唐书·牛僧孺传》	（221）
（五）《“牛李党争”正名》	（225）
跋	（244）

引 言

牛僧孺是唐代历史上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是影响唐代历史甚巨的“牛李党争”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一生经历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宗八朝，当时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多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联。同时，他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颇负盛名的文学家。从晚唐以迄现今，评论、研究牛僧孺者代不乏人。然而，由于牛僧孺是一位处在复杂的历史时期的复杂人物，加之人们视角不同、观点有异，因而无论是在古代史家的笔下，还是在现代学者的论说中，对他的评价一直是毁誉褒贬莫衷一是。

如何对牛僧孺这位对唐代政治史、文学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人物作出全面、公正的历史评价，是唐史研究中一个亟待深入进行的课题。可是由于年代久远，书阙有间，加之，流传下来的一些文献史籍的修撰者即为当时党争中人，这就大大影响了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如李德裕于当政时“奏改修《宪宗实录》所载吉甫不善之迹，郑亚希旨削之。”（《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元年十二月）又如李党人物韦瓘先后伪托刘轲、皇甫松、牛僧孺、李德裕编作《牛羊日历》、《续牛羊日历》、《周秦行纪》、《周秦行纪论》，极力诋毁、诬蔑牛僧孺等人。（参见王梦鸥《牛羊日历及其相关的作品与作家辨》，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7本第3页）有些史籍的撰作着即使不是当时的当事人，但由于个人政治观点的不同或见闻异词，其叙述史事、品评人物也往往有抑扬、好

恶、褒贬之异。因此要准确、全面地认识和评价牛僧孺其人以及与其有着深切关系的“牛李党争”，必须对有关史事进行一番辨伪存真的考证工作。有鉴于此，笔者编写了这部《牛僧孺年谱》，以期通过对其家世、生平、仕历、交游、著述等方面的编年考订来纠补有关文献记载的阙误，对牛僧孺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考察和评价，并进而解决有关“牛李党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学术问题。

由于年谱的体例特点决定了其所记述的内容有欠系统性和整体性。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笔者拟在本谱之前就牛僧孺其人与“牛李党争”作一概括性的综述。

一、牛僧孺其人

(一) 家世与仕历

牛僧孺，字思黯，唐安定鹑觚（今甘肃省平凉地区灵台县）人，生于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卒于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其八代祖牛弘仕隋为吏部尚书，封奇章郡公，为有隋一代名臣；曾祖牛休克，约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任集州刺史；祖父牛绍，官至太常博士；父牛幼闻，仅担任过华州郑县尉这样低级的官吏。可见牛僧孺出身于一个处于日趋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之中，其先世虽然显赫过，但至其父祖辈已家道中落、社会地位比较低微了。

牛僧孺七岁而孤，依外族周氏为生。在外族周氏家度过八年寄人篱下的生活后，僧孺于十五岁时回到长安南下杜樊乡祖居，在那里开始勤奋地攻读先人遗书。不数年，成为名闻遐迩的青年学者。

贞元二十一年（永贞元年）正月，德宗病卒，顺宗即位。顺宗即位后即任用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宰相，以王伾、王叔文为翰林学士，进行“永贞革新”。宰相韦执谊当政后，为了网罗人才，便命部下柳宗元、刘禹锡访牛僧孺于樊川。僧孺因而得以谒见韦执谊，献上自己的行卷之作，得到韦执谊的高度赞扬。大概是韦执

谊的推奖起了作用，本年三月牛僧孺与沈传师、李宗闵等人同年荣登进士第。（参见贞元二十一年谱文）

元和三年，牛僧孺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举。在制举对策中，牛僧孺与应制举人李宗闵、皇甫湜等年少气盛，直陈时政之失，无所畏避。其策文被考策官杨於陵、韦贯之、李益等署为上第，并得到宪宗皇帝的赞许。可是由于其策文冒犯、触怒了当时的当权宰相李吉甫，李吉甫“泣诉于帝”，于是考策官韦贯之等人被贬黜，覆策官裴垍被罢翰林学士，应制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等人也被出为关外官，“久之不调”。（参见元和三年谱文）此次制举风波是引发唐代中晚期持续四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和九年冬十月，宰相李吉甫病卒。十二月，尚书右丞韦贯之拜相。至此，元和三年制举对策后在外滞淹六年之久的牛僧孺方由河南尉入朝为监察御史。此后历官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库部郎中、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直至两度拜相，三任节度使。

会昌元年，牛僧孺镇襄州时，襄州发生特大水灾。此时为宰相当权的李德裕便借机以渎职罪罢免僧孺节度使之职，左迁其为太子少师。未见唐代有因天灾而罢免地方官的先例，如长庆四年六月，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时，“浙西水，坏太湖堤，水入州郭，漂民庐舍。”（《旧唐书·敬宗纪》）又如大和五年七月，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当地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水灾。（《旧唐书·文宗纪》）而且发生这两次水灾时，牛僧孺都在朝中任宰相，牛僧孺不曾因此将李德裕降职，李德裕也未尝因水灾自劾。可见牛僧孺此次罢镇左迁，完全是出于李德裕挟嫌报复。

会昌四年十月，当权宰相李德裕乘讨平泽潞之余威，对牛僧孺展开了进一步的倾轧，使人罗织罪名，诬奏牛僧孺、李宗闵曾

与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交通”，因贬牛僧孺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贬李宗闵为漳州刺史。不久，再贬僧孺为汀州刺史、宗闵为漳州长史。十一月，复贬僧孺为循州长史，宗闵长流封州。

直到会昌六年，武宗去世、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势后，风烛残年的牛僧孺才由循州贬所量移衡州长史。次年（大中元年），牛僧孺又由衡州长史北移汝州长史。大中二年夏秋之际，牛僧孺由汝州长史迁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复转太子少师。本年冬，病卒于东都洛阳，享年六十九岁。至此，他终于从险恶的朋党之争的漩涡中彻底解脱了。

（二）政治品格与政绩

《旧唐书》牛僧孺本传谓其“进退以道”、“识量弘远”、“贞方有素，人望式瞻”。此论虽不免溢美之嫌，但基本上近于史实。当时韦瓘托名刘轲所作之《牛羊日历》虽然曾对牛僧孺进行过泼妇骂街般的百般诽谤，但也不得不承认：“僧孺外唯简默，内多诡诈，甚窃当时之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牛僧孺的政治品格博得了当时社会的好评，甚少可訾议之处。

现代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论述“牛李党争”时认为：“牛僧孺是庸人，但还不算奸人。”（范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第二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牛僧孺“不算奸人”，绝无问题，但把他说成“庸人”却有欠公允，似乎过于低估了其施政才干和政绩。

当代学者王炎平先生是贬牛扬李派之新秀，他在近著《牛李党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中谓：“牛党皆奸恶小人。”（第67页）又曰：僧孺“行事固可鄙，其奸恶尤可恨。”（第

38 页)又曰:“(牛僧孺)的相业,在穆宗朝是助逢吉反对裴度及德裕,在文宗朝是伙同宗闵排摈德裕。而于多难之邦,竟无一善策嘉谋,实不堪成事而足败事,又岂仅尸素也哉!”(第 43 页)考诸史实便知,王氏之说纯是无稽之谈,毫无学术意义上的理据,完全是偏见驱使下的个人情绪化的诋毁之词,不值一驳。(关于僧孺在长庆、大和年间的相业、政绩,可参见有关谱文,此不赘。)尽管如此,王氏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在牛党中,僧孺最负声誉,也有一些事迹可称(如却韩弘贿赂)。”由此可见僧孺政治品格之难以污损。

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牛僧孺虽然没有创建下什么“丰功伟绩”,甚至有时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但从总体上说来,他具有正直的政治品格,为政清廉,执法不阿,不结纳宦官,不贪恋权位,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职位上都做出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基本上是一个应予肯定的历史人物。

为政清直、廉洁奉公、不收纳贿赂,是牛僧孺突出的政治品格,这在当时官场中是难能可贵的。如长庆二年十月,河中节度使韩弘以年老乞罢戎镇,诏可。由于韩弘以前曾在宣武镇搞了二十余年半独立的割据政权,直到淮西镇吴元济和淄青镇李师道被朝廷诛灭后,他才归命朝廷,因而他罢镇入朝任职后,“以宣武旧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财厚赂权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遗。俄而父子俱卒,孤孙幼小,穆宗恐为厮养窃盗,乃命中使至其家,阅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纳赂之所,唯于僧孺官侧朱书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穆宗按簿甚悦。”(《旧唐书·牛僧孺传》)穆宗皇帝因此更加赏识牛僧孺,并于次年三月将牛僧孺提拔为宰相。

不阿附宦官,不趋炎附势,是牛僧孺正直的政治品格的又一突出表现。中晚唐时期,宦官日益攫取中枢权力,势倾天下。在

这种情势下，许多朝臣都竞相依附、巴结宦官，以为进身之阶。当时诸如李德裕、李宗闵、元稹等参与党争的主要人物都曾巴结、贿赂过宦官，并因而爬上高位，史有明文，兹不赘述。而牛僧孺却不仅未曾阿附、巴结过宦官，而且对宦官的干政还进行过抗争和抵制。

长庆元年六月，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李直臣厚赂宦官为其说情。起初穆宗也在宦官的蛊惑下认为李直臣有才干，应予以宽大处理。当时身为御史中丞的牛僧孺在审理此案时执法不阿，坚持不回，据理力争，终于将李直臣治罪。穆宗也幡然悔悟，转而赞赏牛僧孺刚正守法，面赐金紫。（两《唐书·牛僧孺传》）

大和五年，文宗与宋申锡谋诛宦官，不幸谋泄。郑注和宦官王守澄等人便先发制人，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漳王为文宗之弟，素有声望。文宗一向担心有人拥立他，一听宋申锡谋立漳王便信以为真，即命王守澄逮捕漳王和宋申锡严加审查，王守澄等人便欲趁机置宋申锡于死地。面对宦官的淫威，身为宰相的牛僧孺仗义执言，对文宗为宋申锡辩护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宰相，假使如所谋，岂复欲过宰相有他图乎？……申锡心臣敢以死保之。”在牛僧孺和其他朝臣的救助下，宋申锡得以免死，“止行贬黜”。（杜牧《牛僧孺墓志》）

开成年间，牛僧孺出镇山南东道时，辟召为宦官切齿痛恨的刘蕡入幕一事也很能体现牛僧孺正直的政治品格。先是，进士刘蕡于大和二年三月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举时，在对策中激烈反对宦官干政，极言宦官之祸，因而触怒宦官。以致当时的考策官冯宿、贾餗等人虽然非常赏识刘蕡，但迫于宦官的威逼而不敢录取。于是刘蕡便被排挤出京师，不得仕于朝中。开成四年牛僧孺镇襄州后即不避宦官的淫威，毅然上表朝廷，辟召刘蕡入幕任职，待如师友。（两《唐书·刘蕡传》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

的政治勇气的。

不贪恋权位是牛僧孺政治品格的又一特点。敬宗即位后，日事耽宴淫乐，不理朝政，宰相李逢吉和宦官王守澄专权用事，致使朝政日益败坏。当时厕身相位的牛僧孺既无力回天，又不愿同流合污，遂于宝历元年正月激流勇退，毅然决然累表辞去相位，出任武昌节度使。（两《唐书·牛僧孺传》）尽管此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牛僧孺明哲保身、逃避困难的消极精神，但也反映了他不贪恋权位、不甘愿当一个尸位素餐的政治庸人的思想作风。

开成三年，李党人物郑覃、陈夷行与所谓的“牛党”人物杨嗣复、李珣同在朝任宰相，双方因争权夺利而连续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文宗便派遣中使将牛僧孺由东都留守征召入朝拜为左仆射，意欲委以重任。可是牛僧孺自感无力收拾当时朝廷因党争而造成的混乱局面，便于入朝拜谢过文宗后即称疾不朝，甚至也不与和自己有“僚旧”之谊的现任宰相杨嗣复、李珣来往，以逃避党争的漩涡。（《旧唐书·牛僧孺传》）由此可见牛僧孺确实与那些热衷于权位的官僚政客不可同日而语。

牛僧孺不仅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保持了一个恪守儒家传统道德的、较为正直的封建官僚形象，而且在各种职位上均能忠于职守，做出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穆宗时，牛僧孺初任御史中丞伊始，即“以州府刑狱淹滞，人多冤抑”，而“条疏奏请，按劾相继，中外肃然”。（《旧唐书·牛僧孺传》）初露施政才干。前述长庆元年六月牛僧孺不顾忌宦官的干扰依法审理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案，即是他在御史中丞任内秉公执法的典型事例。

宝历元年，牛僧孺以使相身份出镇武昌后，了解到镇治鄂州一带土质疏松，难立城垣，每年都要征发民工板筑城垣，还要征收茅草覆护城墙，加之主其事的官吏往往趁机揩油，民众不堪其苦。于是牛僧孺便从利民便国的原则出发，下令以征收陶砖代替

茅苫板筑之费。五年后，即以所赋陶砖将鄂州城垣整修一新。此后当地民众便不再因修筑州城而受赋役之苦，弊政永除。此外，牛僧孺镇武昌时，还鉴于管内沔州与鄂州隔江相对，虚张吏员，而奏请将沔州并入鄂州，以裁减冗官，精简编制，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两《唐书·牛僧孺传》）开成四年八月，牛僧孺出镇襄州，当时襄州连年水旱为灾，僧孺至镇后即据地造籍，减免贫弱赋税，均入豪强之家，使当地人民生活粗获安定。（杜牧《牛僧孺墓志》）凡此种种，均体现了他秉公尽职的政治作风和值得称道的施政才干。

在思想作风上，牛僧孺独善其身有余，而兼济天下的积极进取精神不足。取此之故，一方面，对于李德裕之党的排挤倾轧他多采取退让的态度，绝少起而抗争；另一方面，对于一般人汲汲追求的权位，他也多采取退让的态度，如他两度拜相期间皆因面对复杂、混乱的政局，不能得君行道，而累表坚辞相位。这固然可以反映他不尸位恋栈的君子之风，但也反映了他缺乏“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胆略和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他政治风格的一个弱点。如《旧唐书·牛僧孺传》记载：“（大和六年）时中尉王守澄用事，多纳纤人，窃议时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说。一日延英对宰相，文宗曰：‘天下何由当太平？卿等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酷，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书，谓同列曰：‘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兹地耶？’旬日间三上章请退，不许。”身为宰相，牛僧孺发出这样的论调确实失之于消极，对此人们历来多所非议。不过，对他的上述“太平无象”之论还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不应过分苛责。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弄清楚当时文宗所致意的“太平”是什么。请注意——

《旧唐书·李训传》：“训既秉衡，即谋诛内竖，……天下之人有冀训以致太平者，不独人主惑其言。”《旧唐书·郑注传》：“时李训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侧，讲贯太平之术，以为朝夕可致升平。”《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七月：“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根据以上记载可知文宗当时所致意的“太平”，其主要内容就是诛除宦官。文宗这种锐意求治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灭此朝食的态度和孤注一掷的策略却失之轻率，是当时的形势所不能允许的。前（大和五年）有宋申锡之祸，后（大和九年）有“甘露之变”，均为覆车之鉴。明乎此，便知牛僧孺作出上述“太平无象”之论乃是当时形势使然。此论既反映了他进取心不足的政治弱点，也体现了他知其不可而不为，不迎合帝意企求侥幸的率直性格。

（三）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在哲学思想上，牛僧孺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天人关系问题，历来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牛僧孺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坚持“天道远”、“人道迩”的天道观。他在《讼忠》一文中批评了“帝王不务为政而务称天命，下不务竭忠而务别兴衰”的行为，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假天道以助人伦，犹虑论诬于失也，况舍人事，征天道，弃迩求远，无裨于教者也。……以道承天，则天无坏者。以乱承天，则天无支者。故支、坏非天也，兴、衰由人也。”（本谱所引牛僧孺文章均见《全唐文》卷六八二，下不一一注明。）可见在天人关系上，牛僧孺是重人事而轻天道的。他深刻地认识到社

会的兴衰治乱，完全是人为的结果，与天道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显然，牛僧孺的天道观是为现实社会政治服务的，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儒家经典《周易·坤·文言》提出的一种对我国传统文化影响甚巨的社会历史观念（也是一种社会伦理观念）。牛僧孺在《善恶无余论》中不仅对这种传统的唯心主义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批判，指出这种观念仅仅是“劝善惩恶”的一种手段，而且指出了运用这种手段的社会弊端。他说：“若庆必加于善人，殃必加于不善人，予恐庆殃之谬加也，力人而已。余固曰：‘善恶庆殃俱无余也。’余庆劝人之善；余殃诫人之恶。则善人之子能不有恃庆怠于善者乎？恶人之子能不有恣恶俟其殃者乎？”无疑，这种批判和认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哲学水平。

在政治思想上，牛僧孺是一个民本主义者。他在《辨名政论》中认为：“舍强国富人（民）而别求帝王之道，则溃溃然无指归矣。……君道无定名，便国利人（民）则君道也。……政有富生人（民）、强国家，皆安得不谓之君道也？”这些原则和主张虽然脱胎于儒家的仁政学说，但不是对孔孟仁政学说的简单重复，而是针对当时的历史实际和社会状况而提出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政治主张。

牛僧孺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内忧外患都比较深重的时期，当时不仅外有吐蕃及其他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内有藩镇的分裂割据，而且更严重的是朝廷内部处于南衙、北司之争和朋党之争的困扰之中。针对这种种深刻的社会危机，牛僧孺撰写了《守在四夷论》，阐述了他解决当时社会危机的政治思想。“守在四夷”本是春秋时期楚国左司马沈尹戌提出的政治观点，他认为国家的安危取决于边境的守备，只有对四夷防守、抚绥，使其不致

内侵，才能维持国家安定。牛僧孺鉴于“洎周汉迄隋，（历朝统治者）多不知守身，但欲令四夷自守”，以致“国内皆成四夷”，从而亡国的经验教训，认为沈尹戌的“守在四夷”论不足为训，“载华而略实，非垂范之旨也。”他认为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统治者的“守身”比加强边防要重要得多。他所说的“守身”的内容是避免为政“非道”，严禁“聚敛”、“奢侈”，不近“声”、“色”，疏远“邪佞”。他深刻地提出：国家的危亡“不由四夷不守于外也。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后四夷，无德者不先守其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国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岂必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哉！”他将政治的清明看作是国家安定的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很有见地的，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四）文学修养和成就

牛僧孺不仅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而且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文学家，在文学领域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牛僧孺少年时即颇负文名。他于贞元末年应进士举时，一代文豪韩愈即对他的文学才能大加赞赏（《唐摭言》卷六《公荐》），当时的当权宰相韦执谊也对他的行卷之作极力推奖（杜牧《牛僧孺墓志》）。于是牛僧孺便因而顺利进士及第。入仕后，他交游广泛，与白居易、刘禹锡、李绅、杜牧等众多著名文学家经常诗歌唱酬、文书赠答。他的文学活动几乎和他的政治活动相终始，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可惜其诗文现在已大都散失，流传至今的只有文章三十一篇，载于《全唐文》卷六八二、《唐文拾遗》卷二七；诗歌四首和一些零散诗句，载于《全唐诗》卷四六六、